

【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会计学的研究范式,了解会计研究的演进,理解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联系和区别,掌握会计研究方法的基本知识点和基本框架,理解并科学评估会计学术研究与实践之间的相关性。

【教学重点】

会计学的研究范式;会计研究的演进。

【教学难点】

会计学术研究与实践之间的相关性。

【思政元素】

科学精神、创新精神、批判性思维方式和方法、发展观念和动态思维方式、爱国情怀、社会责任感、诚信意识和正确的道德观念。

1.1 会计学的研究范式

1.1.1 范式与会计学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源自美国著名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所著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他在该书中提出,范式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界定某一科学领域的核心实践。1970年,库恩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认为研究者倾向于在广泛认可的信念、价值观、假设和技术框架内解决问题,他将这种共享的思维框架称为范式。简言之,范式涵盖了关于研究对象、研究议题的设定、研究方法的选择以及结果解释等方面的原则和方法。研究范式是在特定研究方法论基础上形成的一套研究原则和方法体系。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会计学的理论发展与完善,离不开其研究范式的演变。正如范式的定义,会计学研究范式是会计研究者共同遵循的思考模式和知识框架。回溯会计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会计研究范式主要围绕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这两种范式展开讨论。



扩展阅读 1.1 托马斯·库恩的“范式”故事

1.1.2 规范会计研究与实证会计研究

1985年,霍珀与鲍威尔借鉴了伯勒尔和摩根在1979年关于组织研究分类法的研究,

提出了一个关于会计研究的四象限分类法。这一分类方法包含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一个融合了本体论、认识论、人性的假设以及方法论假设四个方面的连续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一个极端是客观主义，另一个极端则是主观主义；另一个维度则涉及会计研究人员对会计研究工作的态度，一个极端是关注规则和社会秩序的创建，另一个极端则是更关注社会冲突以及社会质变的潜在可能性。基于这两个维度，霍珀与鲍威尔将会计研究划分为主流会计研究、解释性会计研究和批判性会计研究三种类型。主流会计研究是指实证会计研究，它始于客观主义社会观，认为现实是客观的，外在于研究者，因此主要关注的是会计功能而非结果，恪守价值中立。解释性会计研究指的是规范会计研究，它始于主观主义社会观，认为现实是社会性地被创建并通过人类的交往予以客观化，因此主要关注的是对会计实务活动的社会性质的解释，强调价值判断。批判性会计研究并不满足于主流会计研究的实证方法和解释性会计研究的规范框架，而是试图揭示这些研究背后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批判性会计研究者通过深入挖掘会计数据背后的权力关系，揭示出会计实践如何被特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利益所塑造和操纵。批判性会计研究者通过批判性的分析，揭示了会计实践中的不公平、不公正和不合理现象，呼吁对这些现象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改革。至于哪种会计研究方法属于主流会计研究，这取决于会计研究的具体环境背景和实际发展状况。

1. 规范会计研究

会计研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规范会计研究，这一悠久历史早于实证会计研究的诞生。然而，直到实证会计研究兴起后，我们才将这一传统研究方式定义为规范会计研究。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划分源于对会计研究性质的不同认知。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规范会计研究关注的是“什么”的问题，必然涉及价值判断，主要用于描述应该如何计量收益等问题；而实证会计研究则关注的是“是什么”的问题，不涉及价值判断，主要用于解释和预测公司管理层对新会计准则的反应等情境。

规范会计研究对会计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该范式也存在局限性。

①该范式对研究人员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并过度强调研究者对直觉深度捕捉的能力，在探究会计组织和系统时，很难建立起具有普遍性和概括性的理性逻辑分析。因而，在该范式下得出的研究结论常常缺乏经验支持，只能代表个体观点和臆断，其所谓的“理论”只不过是个人主观意见的陈述而已。②该范式主张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来解决会计问题，舍弃了观察和测试的量化方法，简单的描述性方法无法应用于相关分析。③通过理解获得的知识必然无法完全“客观”，它受到个体既有的概念、理论、信念和价值观的影响。此外，解释性会计研究既没有提供社会批评，也没有推动质变，会计理论仅寻求对会计活动的解释，而缺乏理解社会秩序的形成机制。会计活动是有目的、有意识的人类活动，具有主观性和价值性。而且，会计活动因个体主观价值和客观条件的不同而呈现多样性，具有情境性和复杂性。因此，实证主义追求客观化和普遍化的研究范式难以捕捉会计活动的本质，会计研究的目标不仅仅是通过客观量化的研究来了解事实，更重要的是理解和解释这些事实背后的意义，这将成为批判、改进和超越不合理会计现象的基础。

2. 实证会计研究

实证主义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不可忽视。20 世纪 60 年代,实证主义逐渐渗透到会计学领域,带来了大量的实证会计研究,并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成为主流,打破了传统规范会计研究的垄断地位。实证研究方法在会计研究中广泛采用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即认为只有能够被证伪的理论才具有科学性。按照这个理论,一旦出现了无法解释的实际情况(即超出现有理论预测范围的实践),或者找到了无法支持现有理论的证据,研究者科学研究的契机就得以形成。由 Jenson、Watts、Zimmerman 等代表的“罗彻斯特”会计学派将实证方法引入会计研究,认为以规范研究为主的传统会计研究已不再科学,应被实证理论所取代。最终,围绕“为什么管理者会对会计准则做出不同选择”和“政府如何通过管制会计准则来使会计信息对客观实际具有必要的解释力”两个核心议题构建了现代实证会计理论体系。尽管实证会计研究的研究议题非常庞杂,但从根本上来说,仍然围绕着以上两个核心议题(杨雄胜等,2008)。

实证会计研究强调,必须从实际会计实践出发,将研究扎根于经过严格检验的经验数据之中,并具备定量化和精确性的特点。因此,实证会计研究可以为规范会计研究提供大量的经验资料,缩小规范会计研究与实际会计实践之间的差距,从而建立起规范会计研究与丰富多样的会计实践之间的逻辑桥梁,克服了规范会计研究的局限性。然而,实证会计研究方法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具体如下。

第一,实证会计研究范式建立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程序基础上,尤其是通过量化方法处理会计现象,难以完全适用于复杂的社会现象。会计研究的量化过程与自然科学的过程类似,这种过程导致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过分侧重于定量化和模型化,过度依赖数学和统计分析。然而,在某些涉及行为特征、心理反应、激励偏好和思维定势等问题的研究领域,这种方法很难发挥作用。

第二,样本选择不合理。在进行实证会计研究时,如何选择样本取决于研究目的和设计。从理论上讲,样本越大越具有代表性。然而,实证研究方法使用有限的事实和现象来证明普遍命题,因此其研究结果不可避免地具有概率性或偶然性。

第三,难以避免价值判断的影响。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应该是客观中立的,要求研究者排除个人的价值判断,在研究过程中只依靠经验数据等来验证或证伪某一假设,反对先验的价值观对科学研究的影响。然而,在选取研究课题并形成研究结论之前,研究者应考虑到研究结论可能得到的认可程度以及哪些方面会予以认可。此外,个人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因素可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研究过程,从信息输入到输出的速度、测量、可靠性和准确性都会对会计研究结论产生影响。

第四,实证会计研究认为其任务是建立会计科学,将会计视为客观事实来研究,回答“会计是什么”的问题,通过调查、归纳、实验、统计等方法形成规律性的知识。因此,实证会计研究的结论只具有解释和说明的性质,缺乏规范和指导的功能。实证会计研究主张工具理性观,认为会计理论是对客观会计活动的解释,而会计实践仅仅是理论的技术应用。

第五,实证主义将探求因果关系作为理论推导的必要条件,即研究者事先确定了研究

对象中某些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程度和变化方向。然而，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仅仅依靠会计理论研究中主要的因果关系，研究者很可能过于简化会计研究对象，忽视背后隐藏的复杂因果关系，并未考虑到社会经济活动比自然过程更为复杂。未成熟的实证是对丰富真实性的否定，简化了复杂的世界。这种简化倾向实际上违背了科学主义原则，实证会计研究尚未摆脱传统决定论观点的束缚。

1.2 会计研究的演进

1.2.1 西方会计研究的演进

会计理论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初，斯普拉格的《账户原理》（1907 年）和佩顿的《会计理论》（1922 年）的出版标志着会计理论研究的开始。20 世纪初至 70 年代，这一阶段的会计理论研究方法被称为规范研究（normative study）。规范研究方法通常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作为分析处理会计问题的标准，探讨如何才能符合这些标准。

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起，实证研究（empirical study）异军突起。经济学成为实证研究的主要推动力量，实证研究方法首先通过金融经济学和金融理论进入会计研究领域。这一时期的会计理论研究重点转向通过经验分析、假设检验研究和数学建模来研究和创造知识，从而与定性研究竞争，并最终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定性研究，而定性研究在历史上一直是新思维的源泉。

从 1963 年到 1967 年，JAR（*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的前五卷主要由大卫·格林编辑，包含反映理论发展、规范论证、经验研究和历史调查的文章。然而，到了 1968 年，当尼克·多普奇成为编辑时，该杂志越来越多地迎合芝加哥大学推崇的研究，即利用计算机构造的数据库以及使用行为和实验方法的实证研究。1967 年以后，历史和规范论证文章实际上逐渐从 JAR 中消失了。JAR 中实证类文章的百分比从 1969 年的 27% 上升到 1972 年的 60%。随后，TAR（*The Accounting Review*）紧随其后，因为这种研究模式在学术界逐渐流行起来。

1968 年，鲍尔和布朗关于会计收益和股票价格的研究可被视为实证研究的萌芽。1976 年，詹森发表《罗切斯特学派宣言》，宣言中反对以特定价值判断为指导的传统会计研究方法，提倡建立实证会计理论。瓦茨和齐默尔曼于 1986 年出版了《实证会计理论》一书，成为实证会计理论的经典之作。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实证研究方法已成为西方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主流。美国会计学会权威期刊《会计评论》（*The Accounting Review*）刊发文章的基本标准是：该成果对会计思想做出重大贡献。该期刊偏好具有实务相关性的论文，一般不会接受纯规范性或描述性的论文。

进入 21 世纪以来，以计量为主的传统实证研究方法开始多元化发展，越来越注重交叉学科的理论思想和研究方法的互动。例如，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社会网络分析和文本分

析等新兴研究工具逐渐渗透到会计研究领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西方会计研究演进大事记如表 1-1 所示。

表 1-1 西方会计研究演进大事记

时间	主要事件
1907 年	斯普拉格的《账户原理》出版，标志着会计理论研究的开始
1922 年	佩顿的《会计理论》出版，进一步促进了会计理论研究的发展
1963—1967 年	JAR 的前五卷出版，包含反映理论发展、规范论证、经验研究和历史调查的文章
1968 年	鲍尔和布朗关于会计收益和股票价格的研究可被视为实证研究的萌芽
1976 年	詹森发表《罗切斯特学派宣言》，提倡建立实证会计理论
1986 年	瓦茨和齐默尔曼出版了《实证会计理论》，其成为实证会计理论的经典之作
进入 21 世纪后	以计量为主的传统实证研究方法开始向多元化发展，涉及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社会网络分析和文本分析等新兴研究工具

1.2.2 我国会计研究的演进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我国会计理论界主要以传统规范研究为主。传统规范研究方法使用演绎法对会计理论进行研究。这种方法的分析过程通常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人们普遍将其称为三段式研究方法，从而形成规范性的会计理论。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会计研究领域出现了新的问题。我国学者逐渐认识到，基于演绎法的规范性会计研究存在思维狭窄、主观性强、实际价值小、理论脱离现实等缺陷，这种方法无法完全适应我国的实际情况。

20 世纪 80 年代末，我国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将实证会计研究方法引入国内学术界。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学者通过翻译美国著名会计学者瓦茨和齐默尔曼所著的《实证会计理论》，正式将实证会计研究方法引入我国。从那时起，规范研究不再是我国会计研究的唯一范式。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我国学者加大了对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引入力度，发表的相关文章数量也逐渐增加。实证会计的影响逐渐扩大。经验理论和方法在金融经济学中的应用促进了实证会计理论的发展。尽管连续实证研究中存在模型选择、数据收集和噪声控制等各种问题，但由于实证研究能为会计理论的发展提供证据支持，相对而言，实证会计是一个更加严谨的范式系统，因此实证研究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在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开始关注实证会计的实际应用，而不仅仅是介绍和引入。1997 年，大量实证会计研究论文在国内的《会计研究》和《经济研究》等期刊上发表。

进入 21 世纪以来，在我国会计期刊上发表的实证会计研究论文比例大幅增加。2000 年，《会计研究》杂志就发表了 23 篇实证会计研究论文，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实证会计研究



扩展阅读 1.2 中国会计研究方法的演进过程

的发展,实证会计研究方法迎来了新的飞跃。我国学者对实证会计研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李连军(2006)对实证会计研究方法和方法的哲学基础及演化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同时,以公司治理中管理者所有权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为例,总结和分析了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的标准范式。在这之后,我国学者不断完善研究方法,从模仿逐渐走向创新,推动了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发展。

顶尖会计期刊 JAE 在 2022 年刊出了 *A review of China-related accounting research in the past 25 years* 一文,回顾了中国过去 25 年的会计研究。自 1978 年启动经济改革计划以来,中国经历了非凡的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从 1978 年的 2940 亿美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117850 亿美元(均以 2010 年的基期美元计算),每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9%。与中国的高速发展和对中国经济制度日益重视相对应的是,在过去的 25 年里,会计学术期刊上与中国有关的出版物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截至 2021 年底,有 86 篇中国研究论文发表在 5 种顶尖的会计期刊上: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The Accounting Review*,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和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这 5 种期刊中的中国研究论文的数量在最近几年增长最为显著,其中 77 篇(所占比例为 90%)研究报告是在 2010 年之后发表的。

A review of China-related accounting research in the past 25 years 论文的第一部分的制度是人类设计的制约因素,它构建了经济行为(North, 1994)。科斯(1960)首次提出了制度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存在着交易成本。制度包括正式的约束(如规则、法律和标准)和执法机构(如证券监管机构和司法系统)。North(1994)认为政治体制是经济体制的基础,这一观点强调了政治制度对经济体系的深远影响。制度也包括非正式的力量,如文化、规范和惯例。人际关系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中国非正式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研究涵盖了许多不同的研究目标和主题,但连接所有研究的一个中心主题是制度的关键作用。在论文的调查中,有一些研究与中国的政治和监管机构有着很深的联系;而另一些研究则强调中国与外国投资者关系的制度;还有一些研究利用中国独特的制度特点,利用新的数据或貌似外生的监管冲击,帮助研究新的问题并得出更有力的因果推断。

与大多数专注于某一特定研究领域的文献调查不同,论文 *A review of China-related accounting research in the past 25 years* 的调查以中国为中心,审查涵盖大量主题的研究。与中国有关的会计文献的广泛性意味着这些研究并不自然地归入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这促使我们围绕三个相互关联的主题组织文献:①中国的政治和监管机构;②中国与外国投资者的关系;③中国的新数据和独特的监管冲击。该论文发现,许多主题领域仍处于萌芽阶段,因此内容较少。该论文努力增加讨论深度,对特别值得注意的研究进行详细介绍,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和批评,将中国的研究与更广泛的会计文献联系起来,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建议。

该文第二部分内容强调了中国政府在经济中的关键作用。虽然中国在将其经济从指令性模式转变为更加市场化的体系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从定义上讲,中国新出现的体制具有探索性和实验性。一些改革被证明是成功的,而另一些改革则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消

极后果，值得研究并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政府干预和市场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特征。对政府机构相关政策的有效性和可取性有两种广泛的对立观点。一方面，积极的（“扶持之手”）观点强调政府有能力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否则会阻碍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消极的（“攫取之手”）观点认为政府的参与是政治精英为获得财政和政治利益而将资源导向自己的一种手段。中国的情况在这两方面都提供了支持性的证据。中国的官员晋升体系为政府官员提供了强大的职业激励，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Li et al., 2005; Chen et al., 2005），但高度政治化的体系也导致了裙带关系和腐败问题（Cai et al., 2013; Fang et al., 2019; Agarwal et al., 2020）。第二部分中的研究与中国的制度特点有着深刻的联系。我们很自然地会问，这些研究是否可以为一般的会计研究提供参考。在这方面，我们提出一些想法。①中国独特的制度特征有可能为我们对经济现象的理解增加新的维度，丰富经济理论的发展和检验。例如，私人诉讼制度的强度从根本上改变了财务误报和公共执法之间关系的性质。因此，在美国这样的强势诉讼制度中观察到的经验规律可能不会延伸到一些弱势诉讼制度的国家。研究需要一个多样化的制度环境，而不是一个单独的环境（如美国），来描绘一个基本经济现象的更完整的画面。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环境的独特性可以被视为会计课题科学研究的优势。②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制度特征与其他国家的制度特征有一些相似之处。例如，国家所有权在世界各地都很普遍，在美国也存在，特别是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③中国的巨大规模意味着其国内事务会对其他国家产生重大的溢出效应。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国内的股票市场监管如何通过对中国公司海外上市的影响而溢出到其他国家的股票市场，包括美国股票市场。④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巩固，其强大的经济动能和持续的发展态势使其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正因为如此，它本身就值得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关注去深入了解和研究。

第三部分考虑中国与外国投资者的关系。1978 年，中国推出了向全球贸易和外国投资开放的政策。在接下来的 40 多年里，中国摆脱了经济孤立，从 1978 年的零外国直接投资（FDI）和微不足道的进出口，到 2020 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进口额和出口额分别达到 27230 亿美元和 2350 亿美元。中国作为外国直接投资的目的地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在 2019 年获得 1560 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在此背景下，第三部分调查了关于中国企业外国投资的会计研究。具体来说，我们研究了两个投资渠道：①对中国国内上市公司的投资；②对中国海外上市公司的投资。第一类研究考虑了国内外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来源，以及信息不对称对国内外投资者股票价格差异的影响。第二类研究根据困扰许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会计丑闻，研究了这些公司的质量。总的来说，第三部分的研究强调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回报与中国不透明的信息环境和薄弱的投资者保护所带来的风险之间的权衡。

第四部分描述了会计研究人员如何利用中国的新数据和独特的监管冲击来检验新的研究问题，并提供更有力的因果推论。中国的制度有助于使其成为新颖数据的丰富来源。例

如,中国的信息披露规则允许观察某些在其他国家无法(或将一直无法)观察到的变量(例如,可以公开获得关于经纪公司赚取的交易佣金费用和公司签字审计师的特征的数据)。中国的执法机构也是宝贵的专有数据的来源(例如,他们提供了关于审计调整和税收不合规的专有数据)。此外,中国的监管机构通过许多改革使研究人员能够测试新的研究问题,并提供更有力的因果推断。调查强调了研究人员在利用中国的新型数据和监管冲击时面临的挑战。例如,研究人员需要格外小心地确定他们感兴趣的具体法规的影响,因为促使政府通过一项新法规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可以推动其他法规成为整体改革方案的一部分。重大改革举措往往是接连不断的,有时还与其他改革结合在一起,这使研究人员很难确定哪项改革改变了观察到的结果变量。此外,监管冲击通常不会导致观察结果被随机分配到治疗组和控制组。更重要的是,大多数监管改革都是强加给每一家上市公司的,这意味着研究者往往缺乏一个未受影响的上市公司的自然控制组。以下是各个领域的研究问题和利用新数据和监管冲击的方法。①审计:研究人员利用中国的新数据和监管冲击来研究审计问题。他们利用审计师的身份数据来研究审计结果是否受到审计师身份的影响。他们还研究了签字审计师与客户之间的社会联系是否会影响审计质量。②公司治理:研究人员利用中国的新数据和监管冲击来研究公司治理问题。他们研究了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政府干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③财务分析师:研究人员利用中国的新数据和监管冲击来研究财务分析师的角色和影响。他们研究了财务分析师与公司之间的私人沟通对市场反应的影响,以及财务分析师的预测准确性对公司绩效的影响。④税收:研究人员利用中国的新数据和监管冲击来研究税收问题。他们研究了税收政策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以及政府干预对税收遵从性的影响。⑤环境:研究人员利用中国的新数据和监管冲击来研究环境问题。他们研究了环境规定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以及政府干预对环境披露和环境管理的影响。这些研究利用了中国独特的数据和监管冲击,为研究者提供了研究新问题和获得更准确的因果推断的机会。然而,这些研究也面临一些挑战和局限性。例如,数据的可靠性和可获取性,以及研究结果的推广性。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这些问题,并利用更多的数据和方法来加强研究的可靠性和推广性。

1.2.3 会计学术研究与实践

会计学术研究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始终备受关注。然而,在2012年之后,越来越多的会计学者和专家开始对会计学术研究是否充分关注实践提出质疑。美国会计协会(AAA)每年都会年在会上专门探讨会计研究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必要性。研究旨在通过抽象概括现实生活的经验,以期为实践提供反馈和指导。然而,与物理学等具有强烈反馈性的学科

不同,我们如何观测会计研究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呢?杜克大学的Graham教授通过对首席执行官(CEO)、首席财务官(CFO)等高管进行问卷调查,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法。

Graham教授的研究围绕着报告盈余(reported earnings)与披露决策(disclosure decision)展开,通过对400多名高管的问卷调查,确定了影响报告盈余和披露决策的关键因素。该研究得出了以下3个主要结论。①就盈余和现金流的重要性而言,管理层认为盈余



扩展阅读 1.3 会计学术
研究与实践的经典故事

更为重要。管理层将达到或超过盈余基准视为重要考虑因素，因为未达标的盈余可能会受到外部资本市场的惩罚和施压，导致管理层更倾向于采取可能带来长期负面影响的盈余管理策略，并且他们在“后安然时代”很少使用符合 GAAP 标准范围内的会计政策进行盈余管理。②管理层偏好盈余平滑而非波动，因此他们愿意为了平滑收益而牺牲长期价值。此外，高管也重视盈余和财务披露的可预测性。③管理者自愿披露信息的目的是降低信息风险并提振股价，但同时也力图避免后续难以维持的披露先例的产生。通过这项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会计研究与实际应用之间的联系，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Graham 教授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经验丰富的方法，使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观察和评估会计研究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盈余质量 (earnings quality) 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Dichev 等 (2013) 通过对 169 位上市公司 CFO 的问卷调查和 12 位 CFO 以及 2 位准则制定者的深度访谈，提供了对盈余质量的相关见解。从 CFO 的角度出发，他们主要得出以下 4 个观点。①高盈余质量表现为可持续性和可重复性，具体体现在一致的报告选择、实际现金流支撑以及没有一次性项目和长期估计上。②约 50% 的盈余质量受到行业和宏观经济状况的驱动，而非自由裁量因素。③在任何给定时期，大约 20% 的公司通过盈余管理来扭曲外界对公司业绩的理解，其程度通常相当于每股收益的 10%。④外部很难识别盈余操纵，但同行比较以及盈余与现金流之间的不匹配可以提供有用的风险信号。此外，受访 CFO 认为，现行准则制定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数量庞大的规则、自上而下的规则制定方法、忽视匹配原则以及对公允价值会计的过度重视。他们认为，规则导向的审计方式使审计职能变得集中化和机械化，阻碍了审计专业人员的发展。综上所述，CFO 更倾向于将盈余质量视为一个单一且无条件的特征，而不是现有研究认为的盈余质量的衡量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的设定。CFO 的观点与“一个数字” (one number) 的理念相关，这种理念塑造了 CFO 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和内部决策。

融资决策 [包括资本成本 (the cost of capital)、资本预算 (capital budgeting)、资本结构 (capital structure)] 是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Graham 和 Harvey (2001) 对 392 位 CFO 进行了有关资本成本、资本预算和资本结构的问卷调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在项目评估方面，大部分公司采用现值方法，而大多数公司使用公司风险进行折现，而非项目风险。此外，公司规模对公司财务行为有显著影响。大型公司更倾向于使用净现值技术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进行项目评估，而小型公司则更倾向于使用投资回报率标准。②影响债务发行的主要因素包括财务灵活性和信用评级，而在股票发行时，公司更关注每股收益的稀释和近期股价的上涨。③他们的研究结果支持了啄食理论 (Myers et al., 1984) 和权衡理论，但未发现有力的证据支持资产替代、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自由现金流和个人税收等相关理论与内容。

股利政策和股份回购决策 (payout policy) 在 Lintner (1956) 的开创性研究之后，一直被后续学者引用并对股利政策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我们需要反思 20 世纪 50 年代的实践经验是否仍然适用于当下的情境。Brav 等 (2005) 通过对 384 位财务高管的

问卷调查和 23 份深度访谈的研究,对股利政策和股份回购决策的影响因素提出了以下 4 点见解。①保持股利水平与投资决策同等重要,除非特殊情况下,高管倾向于避免降低股利水平。然而,与 Lintner (1965) 的观点不同,目标派息比例已不再是当前影响股利政策的主要因素。②股份回购在当下变得越来越流行,而在 Lintner (1956) 以及 Miller 和 Modigliani (1961) 的研究时期几乎不存在。然而,正如 MM 理论所指出的,公司管理层的回购决策是在投资决策之后进行的。许多高管认为,股份回购比股利政策更加灵活,能够实现择时策略并增加每股收益。③很多高管的观点并未提供有力支持,以解决股利的代理问题、信号传递理论和顾客效应理论 (Allen et al., 2000)。④税务考虑是股利政策的次要影响因素,尽管许多研究认为其并不是股利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

税务筹划 (tax planning and avoidance) 方面,公司积极参与或者不参与税务筹划动机的实证证据并不一致。Graham 等 (2014) 通过针对近 600 位公司税务主管的调研得出以下 3 点结论。①声誉考量被认为是现有文献中探讨公司是否参与税务筹划动机的重要假设,然而,这一前提假设难以通过实证数据获得证明。Graham 等 (2014) 通过问卷调查表明,声誉考虑确实存在。②他们发现财务数据动机也是公司是否参与税务筹划的重要影响因素。样本中超过 47% 的上市公司人员表示,相较于现金税收支出,高管更加看重 GAAP ETR (公认会计原则的所得税费用占利润总额的比例); 而 37% 的上市公司人员表示它们同等重要。③盈余和每股盈余 EPS 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并受到资本市场监管的影响。

决策权配置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方面, Graham 等 (2015) 运用针对全球 1000 多名 CEO 和 CFO 的问卷调查数据集,研究了高管对财务决策的授权程度以及导致授权变化的原因。总体而言,授权决策模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因财务政策、CEO 个人特征和公司特征等因素而变化。在财务政策方面,研究者将其具体分为融资决策、资本回报、并购决策、投资决策和内部资源分配等 5 类。研究发现,在面向外部的决策 (如并购决策) 方面,CEO 倾向于保留更多的决策权;而在需要更多内部信息的决策 (如投资决策和内部资源分配) 方面,CEO 倾向于放权。CEO 个人特征对放权的影响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①同一位 CEO 在不同情况下授权程度不同,当其精力集中于某项政策或并购活动时,倾向于加大放权力度。②不同 CEO 之间的知识异质性导致差异,长期任职和金融背景较强的 CEO 会减少放权力度。在公司特征方面,当公司规模较大或业务较复杂时,CEO 倾向于放权。此外,对于内部资源分配政策,公司会根据 NPV 排名、现金流产生时间、财务约束等规则进行安排,但也受到部门经理声誉和 CEO 直觉的影响。在欧洲和亚洲地区,公司政治和公司社会主义也会影响资本配置决策。

此外, *Journal of Finance* 2022 年接受 Graham 的论文 *Corporate Finance and Reality*, 该篇论文则进一步比较了理论与现实的差异,主要结论有如下 7 点。①文献认为公司价值是未来 (长期) 现金流的折现,公司决策应当关注长期目标,但现实中公司为什么表现为关注短期目标? CFO 表示,公司决策中参考信息的可靠性时效只有 2 年,并且现在变得越来越短,这导致公司很难有把握做出长期决策,因此表现为更多的短期投资决策。②传统观点认为管理层会形成理性预期,其期望往往是经过对未来收益分布严谨评估后的结果,但

CFO 的问卷调查显示管理层预测中存在大量的正面或负面意外盈余。③文献中假设公司决策是理性的、风险中性的，CFO 的问卷调查显示公司决策是保守的，公司设定的投资门槛远远大于其资本成本，因此，在实践中公司选择的是较大的净现值 (NPV) 项目 (NPV>>0)，而不是 NPV 为正的项目。④现有研究假设公司在跨期平衡边际成本和收益，暗示公司决策会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但 CFO 的问卷调查显示，企业决策具有黏性。⑤文献中假设管理层在决策过程中考虑了复杂情况的多个维度，但 CFO 的问卷调查显示，公司决策没有想象中的复杂，小型公司仍采用令人诟病的回收期法，NPV 仍是投资决策的重要方法。⑥现有研究通常假定市场是有效的，但 CFO 的问卷调查显示，他们仍然会在发行证券和回购时进行择时，并且认为自己有内部信息优势。⑦不同于传统的股东财富最大化假设，CFO 的问卷调查显示，他们现在也会将利益相关者纳入考量范围，追求其与股东的平衡。

杜克大学的 Graham 多年来对高管的问卷调查显示，公司财务研究与现实经营实践有很强的关联性，但仍具有一定的距离。会计学术研究与实践之间的相关性到底有多大？发表在 *Accounting Horizons* 2022 年第 2 期的一篇文章 *Relevance of Accounting Research (ROAR) Scores: Ratings of Titles and Abstracts by Accounting Professionals* 对此进行了探讨，文章通过构建相关性指数来量化学术研究与会计实践之间的相关性。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不同行业的会计专业人员发放问卷，让他们阅读 2016—2018 年发表在 TOP 会计期刊（12 本杨百翰大学的会计杂志排名^①）的论文标题和摘要，并回答相关问题，最后作者对问卷结果进行总结分析，得出会计研究与实践之间的相关性指数。其中，被发放问卷的会计专业人员主要包括：全国多所大学的会计教师，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人士，世界 500 强企业的会计专业人员，政府、非营利组织和其他团体的会计专业人员，美国注册会计师，等等。参与问卷填写的人需要在会计信息系统、审计、金融、管理、税收这 5 个会计领域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选择之后，会被随机分配该领域的 5 篇论文的题目和摘要，并回答 4 个关于会计研究相关性的问题。具体问题如下：①你是否想看全文内容？②你是否愿意和同事分享这篇文章？③你是否能将这项研究应用于一个现有的或预期的问题？④你是否会投入更多时间或资源来更加了解、扩展或跟进这个话题？

每篇文章会被分配给 5 个人，因此每篇文章一共能获得 20 个答案，如果所有的回答都是“是”，说明文章的实践相关性最高，相关性指数 (ROAR Score) 取值为 1。如果所有的答案都是“否”，则取值为 0，ROAR Score 的单位变动范围是 0.05。

将结果按杂志进行分类，分析发现 *The Accounting Review* 的总体相关性指数最高，排名第一，但平均相关性指数排名第六，如表 1-2 和表 1-3 所示。结果表明，虽然 *The Accounting Review* 发表了大量具有实践相关性的研究，但其文章的平均相关性低于其他一些期刊。

① 包括：*Accounting Horizons (Horizons)*;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AOS)*; *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AJPT)*; *Behavioral Research in Accounting (BRIA)*;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CAR)*;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JAE)*;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JAR)*;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Taxation Association (JATA)*;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JIS)*; *Journal of Management Accounting Research (JMAR)*;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RAST)*; and *The Accounting Review (TAR)*。

表 1-2 期刊排名——总排名（通过计算 ROAR 总分得出）

期刊	总排名	各研究主题的期刊排名					
		会计信息系统	审计	金融	管理	税收	其他
TAR	1	3	2	1	3	2	4
CAR	2	5	3	2	2	3	3
JAE	3	—	7	3	5	5	—
RAST	4	7	10	4	6	4	9
AJPT	5	6	1	8	10	9	—
Horizons	6	4	4	6	6	11	2
JAR	7	—	9	5	9	6	5
AOS	8	2	6	7	4	7	1
JIS	9	1	8	9	11	10	8
JMAR	10	9	11	12	1	12	6
BRIA	11	8	5	11	8	8	7
JATA	12	—	12	10	12	1	—

表 1-3 期刊排名——平均相关性指数（通过计算 ROAR 平均分得出）

期刊	平均相关性 指数排名	各研究主题的期刊排名					
		会计信息系统	审计	金融	管理	税收	其他
BRIA	1	8	3	10	1	2	2
Horizons	2	6	6	1	5	4	4
AJPT	3	1	8	3	2	3	—
JAE	4	—	7	2	3	6	—
JIS	5	7	2	9	11	1	8
TAR	6	3	5	6	6	9	2
CAR	7	4	9	4	7	8	1
JATA	8	—	12	11	12	7	—
RAST	9	2	10	5	4	5	5
JAR	10	—	1	8	8	11	7
JMAR	11	9	11	12	10	12	6
AOS	12	5	4	7	9	10	9



思考题

1. 什么是会计学研究范式？
2. 规范会计研究与实证会计研究间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
3. 有哪些方法或者思路可以评估会计学术研究与实践之间的相关性？请举例说明。



即测即练

自
学
自
测



扫
描
此
码